

学林

◀ (上接3版)

最不可靠”。

我明白那是善意提醒,不针对具体情形人物。其实,正因为我担心记忆不一定可靠,才走上求证之旅。但我也意识到,一概而论“记忆最不可靠”,恐非求可靠之道。应当不随成见,因人视情,思辨解析,合理运用史料。我有多次经验,父亲不同于众的亲历,常含特殊启迪,导向值得深究之域。我也略具敏感,本题似有余地。故我没有轻易放弃,而是怀着忐忑之心,调节方向,探视卫礼贤有无佛缘。

康教授替我检索卫礼贤全部出版物目录,说没有任何涉佛。

知我尚未死心,康教授坦言:“but I am not a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he returned to China during the 1926—1929 period.”(“我无法确定他[卫礼贤]在1926—1929期间,是否回过中国。”)康教授建议我去找卫礼贤孙女 Bettina Wilhelm (贝蒂娜·威廉)。他说贝蒂娜·威廉刚拍了一部电影,专讲卫礼贤,应该比较熟悉她祖父的生平。康教授与贝蒂娜无直接联系,指点我求助 Rice University (赖斯大学)的 Richard Smith (理查德·史密斯)教授。

这轮再次联系康达维教授,是**第四站**,可谓中转站,电邮时戳在2014年10月。康教授的开通与热心,使我增强信心。

因遇他事干扰,也需梳理思绪,我没立刻请教史密斯教授。间歇约九个月,我再次启程,勘察卫礼贤涉佛的蛛丝马迹。

卫礼贤涉佛寻迹 (上):茫然无影

第五站是赖斯大学,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士顿。2015年7月,我给理查德·史密斯教授连发两封电邮,简述父亲回忆要点以及我和康达维教授的讨论。史密斯教授是研究《易经》的专家。卫礼贤翻译的《易经》,享誉甚高。迄今通行的《易经》英文译本之一,即转译自卫礼贤的德文译本。

史密斯教授回邮说:“I am pleased to hear about this exciting development.”(我很高兴听到这个令人兴奋的进展。)这个“进展”,指的是沈仲章叙及卫礼贤与佛经翻译。史密斯教授的敏锐目光,对我是个鼓舞。

史密斯教授当即电邮同发



◀ Richard Smith (理查德·史密斯), 本人提供



▶ Bettina Wilhelm (贝蒂娜·威廉), 征得同意引自本人网站



◀ 邢义田,本人提供

卫礼贤的孙女,陪我来到在德国的**第六站**。

贝蒂娜·威廉很快回邮,说她祖父1924年后没有再回中国。而对卫礼贤翻译佛经之可能,并无反应。我大概显得有点固执,又调整重申关注点,追问能否找到卫礼贤与钢和泰交往的任何记录。贝蒂娜答曰,该问 Ursula Ballin (厄休拉·巴林)博士。接着写道,巴林“is working on a big biography on Richard Wilhelm for many years. If anybody knows something, it is her.”(巴林已花费多年时间,在撰写大部头的卫礼贤传记。如果有人能知道任何信息,那就是她了。)贝蒂娜还告诉我:“She says that she’s come across the name of Staël-Holstein during Richard’s time in Qingdao, but rather marginally.”(她[巴林]说她曾见到,卫礼贤在青岛时,记有钢和泰的名字,但似乎仅是沾边。)

厄休拉·巴林的中文名叫吴素乐。于是得提一下我岔道台湾之旅,时间其实早些,但因是旁支,至此才关联上主干,且算**第七站**。大概是这么回事,我初步浏览资料时,读到吴素乐1991年的“Richard Wilhelm—Founder of a Friendly China Image in

T wentieth Century Germany”(《卫礼贤:二十世纪德国的友善中国形象创始人》,载《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20期)。我见是专题学术文章,欲求联作者。了解到从1986到2001年,吴素乐在台湾“中研院”近代史研究所任副研究员。我托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邢义田帮忙,不久便打听到了吴素乐在德国的电话号码。可我担心,那端第一个拿起话筒者,开口只说德语,迟疑未试。

贝蒂娜征得吴素乐的同意,传来了电邮地址,于是我直达**第八站**。

吴素乐当天回复说:“I am intrigued by your information that your father assisted RW with a translation.”(RW为Richard Wilhelm缩写。大意为:“我对你父亲协助卫礼贤翻译之事感兴趣。”)可第一封邮件没言及卫礼贤涉佛,而且她提供的卫氏在华年月,与父亲所述译经项目,时间不吻合。卫礼贤在北大阶段的日记中,确实多次提到一位姓沈的,但那是沈尹默,不是沈仲章。

至此回顾历程,我从父亲回忆出发,凭籍电邮走访中国大陆、美国、中国台湾、德国,从专题专家到直系亲属,多处叩门求教,心存希望。可是,过了

一站又一站,没人告知卫礼贤与佛沾边。

我失望茫然。

卫礼贤涉佛寻迹 (下):日记留痕

吴素乐表示,她愿为我仔细搜索卫礼贤的日记笔记。而父亲沈仲章的独特回忆,也为吴博士提供了新启示,她依此钻探“矿藏”。

2015年8月9日,吴素乐来邮报捷。她根据卫礼贤日记(不一定摘原文),连续成段,夹叙夹议。下面我改以列单形式,分归三组,各冠小标题,择要概括其述,选译其评为“吴按”。

第一组未察佛缘:

1922年1月到3月,卫礼贤坐船来中国。旅途中大量阅读(read a great deal),但无一涉佛(but nothing on Buddhism)。[沈按:赞同吴素乐陈述这一背景。三个月的读书单,映射卫氏来华准备范围,佛学未在内。]

第二组始见涉佛:

2月底,卫礼贤途经柬埔寨,访问佛教寺庙,与僧人聊冥思(meditation)。[吴按:这至少显示他对佛教的一般兴趣(general interest)。]

5月下旬开始,卫礼贤在一些社交场合与钢和泰接触,聚会时有钢和泰近友如胡适等。[沈按:之前我已与吴素乐讨论,因父亲回忆钢和泰推荐他协助德国教授译经,假定钢和泰是将卫礼贤引向佛学之关键人物。亦可参见下文吴按。]

8月,卫礼贤与一批外交官去北戴河避暑,其间与钢和泰多次单独会面。有次谈话长达三个半小时。[吴按:虽然内容不详,但这一系列会谈建议,钢和泰大概已说服卫礼贤相助翻译佛经。]

其后数月,卫礼贤与钢和泰时有相聚,包括共进午餐。

第三组步入佛学(下列几则引号内为吴素乐摘译的卫礼贤日记,皆非完整句):

11月13日,“晚间六点半到八点,去钢和泰处;跟Hinze(?) Hinge(?)一起翻译佛教评论(translated Buddhist commentaries)。”[吴按:完全不知道Hinze Hinge的意思。也许是一个人(卫礼贤对中国人名,常任意自创罗马拼音,无固定规律),也许是词典或参考书。沈按:注意“翻译”二字,但猜测不是整本佛经。]

11月7日,“下午在钢和泰处,佛经。”[沈按:此处佛经用单数形式。]

11月21日,“钢和泰处为佛学著作(work)。”

12月12日,“晚间在钢和泰处,佛经。”[吴按:注意佛经用复数形式。]

我当即电邮吴素乐,祝贺她的发现。我写道:我很兴奋地得知,卫礼贤早在1922年,已对佛学发生兴趣,这将使人们对卫礼贤的了解更为完整。

吴素乐回邮说:“Thanks for your mail. I, too, was excited to discover RW’s commitment to Buddhism and am grateful to you for having put me onto this trail.”(大意:“感谢你的电邮。我也对发现卫礼贤承诺佛学而感到兴奋,并感激你把我引上这条途径。”)“The fact that until now nothing was known about ‘RW & Buddhism’ is a little surprising.”(大意:“卫礼贤与佛学’迄今鲜为人知的这一事实,有点令人吃惊。”)可见,连正在撰写大部头卫礼贤传记、被卫氏后裔贝蒂娜评为“如果有人能知道任何信息,那就是她了”的吴素乐,对发现卫礼贤有涉佛,也感“兴奋”,并对卫礼贤佛缘长掩,也感“吃惊”。

吴素乐还表示,她将凭借“new insight (thanks to you)”(新视角,感谢你),重申她掌握的卫氏档案,重点关注1924年以后。

父亲的回忆促成这个突破,导向这个新视角,大振士气。尽管我最初联系吴素乐,已讲明正在写文,请她为我查寻原始资料。但是,出于尊重,我没有急于自行公布这个发现。

我是这么考虑的,吴素乐致力于卫礼贤专题多年,虽因我的要求与提示,使得卫礼贤关注佛学的亲笔记录出土,但挖掘毕竟很辛苦。吴素乐告诉我,卫礼贤的这些笔记,显然只是为他自己留作参考,写得匆忙,字体极小(tiny),常用缩写,字迹很难辨认(hardly legible)。

我决定等一段时间,让吴素乐先有机会,向外宣布这一里程碑。但我写父亲佛经翻译之事,也不可能绕过卫礼贤与佛学,因而本文也随之搁下。两年多过去,够长了。我向吴素乐打了招呼,重续本专题。初稿成后已摘相关数节,请她过目。

在北平的真身:继任鲁雅文

且说2015年8月,我把卫

(下转5版) ➔